

ZENG GUO FAN QUAN SHU



曾国藩情感秘事

曾
国
藩
全
书
ZENG GUO FAN QUAN SHU



远方出版社

曾國藩情感秘事





曾国藩全书

主编 梁勤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阿荣

曾国藩全书

主编：梁 勤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县华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10.5 字数：5000 千字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套

ISBN 7 - 80595 - 769 - X/K·27

定价：1980.00 元

目 录

序 言	(2)
第一章 国之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国无以为家 ..	(4)
1. 报孝国家，匹夫也尽情	(4)
2. 家、国两择，忠孝难全情	(13)
3. 力挽狂澜，镇压须绝情	(23)
4. 杀李秀成，一石二鸟，不“忠”，不义、不仁，冷酷无情	(29)
5. 效忠清廷，剿捻无功却羞情	(34)
6. 位高愈忧国，难打交道君臣情	(39)
第二章 家之情，人乃感情动物，无情未必真豪杰	(48)
1. 薪尽火传父子情	(48)
2. 严兄如父手足情	(55)
3. 长兄乃姐妹妹情	(62)
4. 举家皆忠报国情	(66)
5. 掀天揭地须控情	(74)
6. 苦口婆心用真情	(78)
7. 亦惰亦傲是骄情	(85)
8. 宠辱不惊君子情	(92)
9. 爱女反成害女情	(95)
10. 倾爱子满腔亲情	(96)
11. 山高水长尽亲情	(101)
第三章 事业情，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为人须敬业	(108)



1. 头脑清醒，关键时刻莫忘情 (108)
 2. 包裹严实，毁誉不露情 (112)
 3. 不欺人不自欺，以诚相待凭真情 (113)
 4. 慎独诚静，莫自作多情 (119)
 5. 随其自然，效老庄忘性忘情 (126)
 6. 居安思危，逆境咬牙须忍情 (132)
 7. “一品”宰相，俭约一世“品廉”情 (133)
 8. 功高盖主，激流勇退，谙世情 (138)
 9. 慎用，善用人，广结善缘好人情 (141)
- 第四章 友之情，多个朋友多条路，友情胜亲情** (146)
1.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146)
 2. 忠、诚、义即真、善、美 (153)
 3. 患难戎侣胡林翼 (158)
 4. 曾、左裂罅胡雪岩 (167)
 5. 曾胡联手创伟业 (178)
 6. 荐人数千遍天下 (185)
 7. 千年不遇性情人 (197)
- 第五章 婚姻情；香火承接繁衍后世尤须慎重** (209)
1. 不择高室名门，只要纯情 (209)
 2. 女儿婚姻不幸，并非慈父寡情 (214)
 3. 夫妻间，最可久贵惟真情 (218)
 4. 成婚三戒，做人持家应至情 (222)
 5. 忍辱负重尽妇道，为封建礼教殉情 (226)
 6. 举案齐眉，厮抬厮敬夫妻情 (227)
- 第六章 书之情，手不释卷，嗜书如命，一生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 (232)
1. 不弃不舍，落花流水总无情 (232)





2. 不读书不可活，片刻难舍墨香情 (235)
3. 晚年仍嗜书如命，陶冶性情 (238)
4. 死前一日写日记，阅《张子》已无神情 (243)
5. 终生遗憾，未能著书不了情 (250)
6. 效孔明鞠躬尽瘁，难已一世情 (258)
- 第七章 人之情，红尘三千，任谁也跳不出五行三界** (271)
1. 流莺画舫公然过夜，狎妓情 (271)
2. 名、实不能两全，阳奉阴违虚假情——金陵克、湘军富 (272)
3. 狼烟四起，秦淮河升平歌舞情 (275)
4. 吐血数口，自古才子多风情 (277)
5. 口无遮拦，议人长短不近情 (279)
6. 嬉游狎褻，闲惹六欲七情 (287)
7. 烟戒棋败，陪伴终生围棋情 (293)
8. “明年不祥”，求人占卜迷信情 (294)
10. 为文训子刊家书，以表忠情 (300)
11. 天命之年纳小妾，不得已而为之情 (309)
12. 信神信鬼，万里神通天地情 (316)
13. 国丧期间纳妾，“忠”乃伪情 (326)
- 第八章 真性情之曾国藩遗文选录** (330)
1. 朋辈友情交流的心声（书信精选） (330)
2. 心灵深处真情的流露（书信精选） (365)
- 附录：科举制度的产物——洋人眼里的曾国藩** (412)



卷首联语

一

善果证药因，愿斯世无灾无害；
拈花参妙谛，惟神功能发能收。

二

窒塞私欲，经常念及男儿有泪之日；
惩禁忿怒，应当思考人到绝气之时。



序 言

捧献读者诸君面前者，乃曾国藩系列，感情卷。

感情者，心之声也。因感生情，因情有感，人属感情动物。情感二字，为人父、为人夫、为人兄、为人臣者之曾国藩，苦读十年，京官十年、戎马生涯、喋血死生复十年，感尤重，情益深。非等常人生匆匆之过客无痕，喜怒哀乐、火热水深，三次自杀，两遭亡弟，裁湘军自断臂膀，恭圣听虚委周旋，战战兢兢、恹恹惶惶，忧谗畏讥，宠辱隐忍，惧喜难忧，讷于言，慎于行，事事躬躬，时时自省，日日日记，朝朝家书，虑己虑家，已居高位，家为望族，堤出潮，枝高折，其殊多生之艰辛、活之不易、官场应酬、仕途坎坷、宦海沉浮，惟谁可解？

为人父，倾尽心血育二子，兄纪泽官至大清使节，威名遐迩；弟纪鸿算学精通，圆乃父师夷长之梦。为人夫，恪尽夫道，晚年纳妾为抓癣痒竟自责不已。为人兄，死者长已矣，世受皇恩，生者官居三公，其教也谆谆、情也殷殷。为人臣十年疆场、血漫山河，固皇家基业同治中兴，染自家顶子代代恩泽。

观其国之情、家之情、事业情、朋友情、婚姻情乃至读书情，皆泻纸面透纸背而洋溢浸染其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其忧国爱家、敬业重友、婚姻美满、嗜读如命之形象，无不毫发毕现。

无庸讳言，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位列公卿权极人臣内圣外王者亦七情焉六欲焉、三界焉五行焉，万丈红尘惟吾净者世所无也。立体、多元、多面、复杂、矛盾者，方为曾国藩也。



司

臧否人物，人过百年、百年历史人物，颇多争议，见仁见智，如菜一盘，竭力求原味原汁，由己品尝，而已
是为序



第一章 国之情，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无国无以为家

1. 报孝国家，匹夫也尽情

作为一个传统的士大夫，曾国藩对孝十分重视，这是理所当然的，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曾国藩的孝不仅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对家里老人的照应上，更重要的是当忠孝发生矛盾时，往往以忠代孝作出正确的选择。在这一方面，似乎跟家传有很大的关系。如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后，先后送出四个儿子参军赴前线与太平军作战，并勉励其尽忠报国。太平军自咸丰元年（1851）揭举义旗于广西金田村之后，势如破竹，所向无敌，于次年入湘过道县，又占郴县、攻长沙，而湘乡境内的会党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亦揭竿而起，封建统治秩序受到了严重冲击。对此，曾麟书心急如焚，坐卧不安。为此，他在与本县知县朱孙诒、乡绅刘东屏等组织乡勇前往镇压农民起义之外，还多次写信给在京作官的曾国藩，向他介绍“匪情”，表示要继续招募乡勇，以“卫吾道”，希望他“赞襄庶政，矢慎矢勤，以报皇恩于万一”；官阶愈高，“接人宜谦，一切应酬，不可自恃。见各位老师，当安门生之分，待各位同寅，当尽协恭之谊。”

早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星冈病故之时，曾国藩意欲回



回

家奔丧，曾麟书便去信要他安心做官，不必南归故里：“努力图报，即为至孝，何必作归家之想”；“祖父生前爱尔特甚，以尔受国厚恩，必能尽心报效。尔今日闻讣信，能体祖父此意，即所以孝祖父，毋以感伤之故而更系念于予夫妇也。”太平军进入湖南后，曾国藩念及家人安危，遂有请假归家之念，曾麟书便又去信叮嘱他不要顾及家中小事，应以国家安危为重、为急务。他告诫曾国藩说：“官秩是朝廷所颁，职分是己躬所尽。尔今所任礼部侍郎兼署刑部侍郎，礼部位清贵，刑部事繁重，君恩厚矣。唯日夜孜孜尽力供职，以报恩于万一，即是尽孝之道，何必以予夫妇为念而有归省之辞也。”他还教导曾国藩须明白这样一个道理：

做官者，不问官秩加不加，只问职分之尽不尽，庶外可以对吾君，内可以对吾亲。……盖官秩愈高，则职分愈重。念兹在兹。恪供尔职，乃可以对吾君而无愧于为臣尔。尔在信中谈到，今冬有省亲之举，希三思而行，不可只顾私念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孝经》中以忠事君，谓中年时竭力做好官，即是为孝。尔年四十一岁，正是做官之时。为朝廷出力，以尽己职，以答皇恩，扬名显亲，不啻曰倚吾夫妇之侧，何必更念南旋孜孜焉。现今各地匪患昌炽，尤其“发匪”横行桂、湘、鄂诸省，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切莫有思亲之情，想家之念。当此时事维艰，宜为君上分其忧于万一。进言可有益于时事，皇上圣明采用之，亦未可知。又，劝同寅各抒所见，以呈奏皇上集群谋而用，教匪不难除矣。所以，关于南归不南归的问题，要视时势之可不可。我在家中本无定见，觉得全力组织团练，保全一方，亦草野之臣思报君恩于万一耳。

忠孝不能两全，往往是封建官员常常面临的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的观念曾经是主张孝大于忠，并以此去要求别人。可是，当问题落到自己头上时，他又转而认为孝要服从于



忠。

1853年1月21日，正当曾国藩权厝母亲于居室后山，“拟另觅葬地，稍尽孝思”之时，巡抚张亮基转来了咸丰帝的寄谕：“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者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这项寄谕立即打破了曾国藩的宁静生活。清依古制，父母死，官吏均得在家守制三年后始得复官。曾国藩正是这样打算的，谁料，仅三个多月，皇帝便叫他墨经从戎。墨经从戎，他是坚决反对的，一年多以前，即咸丰元年，当他在京城听说江忠源墨经从戎时，他曾振振有词，力加阻止。江忠源字常孺，号岷樵，湖南新宁人，道光十七年举人。道光二十七年曾在家乡办团练，镇压瑶民起义。接着，历任浙江省秀水、丽水知县。大学士赛尚阿至广西围歼太平军之前，在左景侨上书言事，其中有一条提及江忠源善带兵，疏调他至军前效力。曾国藩闻此事，“欲行阻止，而赛公已褫牙成行矣”。此时江忠源正在家守制，得谕旨，即与其弟江忠浚募乡勇五百人，奔赴在广西的副都统乌兰泰帐下。曾国藩立即写信给正在粤中为大军筹粮饷的友人严正基说：“岷樵读礼山中，谊为乡里御寇，然墨经从戎，则非所宜。弟比有书，告其不必远出。君子爱人以德，似应如此。阁下以为然焉否也？”他以“爱人以德”的姿态，动员友人来劝阻江忠源。他还直接给江忠源写信说：“粤西盗贼方熾，足下所居，逼迫烽火，团练防守，未可以已。或有企慕谋勇，招之从军，则苦块之余，不宜轻往。斯关大节，计之宜豫。”不久，再次写信给江忠源说：“吾子在忧戚之中，宜托疾以辞，庶上不违君命，下不废丧礼。”又说：“顷闻吾弟被命即行，虽军旅墨衰，自古所有。然国朝惟以施之武弁，而文员则皆听其尽制，无夺情之召。”他还为江忠源出谋画策说：“所可幸者，闻尚



回

在乌公幕府，未尝署一官，领一职，犹为无害于义。将来功成之后，凡有保奏议叙，一概辞去，且预将此意禀明乌公转达赛公，再三恳告；如不保叙，则仍效力行间，终始其事；如不允从，则托疾归去。”“若略得奖叙，则似为利而出，大节一亏，终身不得为完人矣。”在曾国藩看来，最好不要墨经从戎，去了，也要只效力不当官，只有这样，才叫忠孝两全，即“从戎以全忠，辞荣以全孝”。他再次警告说：“君子大节，当为世所取法，未可苟焉已也。”

到咸丰二年十月，曾国藩在家守制，犹写信给友人刘蓉说：“岷樵去年墨经从戎，国藩曾以书责之，谓其大节已亏。”

然而，言犹在耳，只过去一个月，有亏大节的墨经从戎的事又临到自己头上来了。因此他草写了一份奏稿，请求在家终制。并在接到谕旨后的第三天，即十二月十五日（1853年1月23日），写信给住在京中的内兄欧阳秉铨（字牧云），申述自己不能墨经从戎的原因：“弟闻讣到家，仅满四月，葬母之事，草草权厝，尚思寻地改葬，家中诸事尚未料理，此时若遽出而办理官事，则不孝之罪滋大。且所办之事，号召绅耆，劝其捐资集事，恐为益仅十之二，而扰累者十之八；若不甚认真，不过安坐省城，使军需局内多一项供应，各官多一处应酬而已。”这是他在申明“大节”之外，多道出了一层“难寻头绪”、心无把握的理由。

曾国藩在京城不惬意时，虽多次向友人表白过归隐山林的意愿，但真正回到田园时，实际上却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因为当时农村闹“土匪”，人心惶恐，曾国藩虽然热孝在身，却写了三首《保守平安歌》，第一首是劝诫乡民《莫逃走》，第二首是鼓励乡民《要齐心》，第三首是号召乡民《操武艺》。他给刘蓉的信中也表示：“国藩居湘乡之上，为湘乡之民，义不可不同心合力保护



桑梓，拟于百日之后前赴县门，一则叩谢石樵先生枉吊敝庐之寺，一则到局与诸子商榷，以明同舟共济之义。”并且提出了“壮勇贵精而不贵多，设[练]局宜合而不宜分”的建议。在出仕与归隐的矛盾中，显然出仕始终是他的主导思想，而归隐只不过是“一时牢骚”。恰恰在他写信给欧阳秉铨的同一天晚上，接二连三的事发生了。首先是巡抚张亮基派人送来两封信，说太平军攻克沙城不下，已绕道北上，经宁乡，过洞庭，于11月攻克岳州，翌年元月（农历十二月）占领了武汉三镇，巡抚常大淳死难。他催促曾氏立即出山。午夜，翰林院庶吉士郭嵩焘也风尘仆仆，赶来曾家吊唁。他知道曾国藩心中犹豫，力劝他出保桑梓，说：“公本有澄清天下之志。今不乘时而出，拘守古礼，何益于君父？且墨经从戎，古之制也。”他父亲曾麟书也说：“以嵩焘之言为正。”于是曾国藩立即以遵父命为由“收回所具疏，定计赴省”。十天之后，已经到达了长沙省城的曾国藩，回忆起这一过程，又写信给欧阳秉铨道：“前信写就，正拟专人送省城，请张抚台代为发折，十五夜接张抚台来信二件，知武昌失守，不胜骇叹。郭云仙亦于十五夜来我家，劝我到省帮办团练等事。弟以湖北失守，关系甚大，又恐长沙人心惶惧，理宜出而保护桑梓，即于十七日由家起行，二十一日抵省。”但是，他抵省后，在《附陈办团稍有头绪即乞守制片》中，仍然向皇帝做了一个姿态：“再三思维，以墨经而保护桑梓则可，若遂因此而夺情出仕，或因此而仰邀恩叙则万不可。”

曾国藩从十二月十三日奉谕旨到决定于十七日动身赴省，即从墨经从戎的反对者转变为墨经从戎的践履者，其间仅仅四天！要求他人，“斯关大节，计之宜豫”；对于自己，则“理宜出而保护桑梓”，为何如此改计之迅速？对于江忠源的那些叨叨说教，竟然完全置之脑后，别人的劝进，父亲的首肯，固为客观因素，



主观因素又如何呢？“理宜出而保护桑梓”和“义不敢潜身顾私”，也许是他此时的真实思想；但江忠源出保桑梓，他为什么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劝阻呢？而且，他一反以往的论调，谓“江岷樵所带壮勇二千，甚为可恃，即留于长沙防守”，又是为什么呢？这中间，必定有曾国藩对个人的进退出处的更深层的思考，在“因此而仰邀恩叙则万不可”一句中，已经透露了个中信息。但曾国藩毕竟是聪明人，在忠孝问题上这么出尔反尔毕竟做得太过，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一个特殊的姿态，出来为朝廷做事，但不受官职。但是曾国藩的本意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咸丰四年八月十九日，湘军会师之后，曾国藩知道胜利在即，特向咸丰帝作了一姿态，上了一个恭谢天恩折，说自己丁忧在籍，墨经从戎，“常负疚于神明”，不敢仰邀议叙，仍荷温纶宠锡，惭悚交增。“嗣后湖南一军或者克复城池，再立功绩，无论何项褒荣，何项议叙，微臣概不接受。”在此时此地发出此折，分明是在伸手邀荣求官。怎奈咸丰帝也很聪明，一下子洞察了曾国藩的心思，朱批道：“知道了！殊不必如此固执。汝能国而忘家，鞠躬尽瘁，正可慰汝亡亲之志。尽孝之道，莫大于是。酬庸褒绩，国家政令所在，断不能因汝请稍有参差。汝之隐衷，朕知之，天下无不知也。”除讲了一通“忠孝”的道理，咸丰帝也分明向曾国藩许下了“酬庸褒绩”的愿。而从“汝之隐衷，朕知之，天下无不知也”三句，即使千载百年之后，也令人似乎看到了曾国藩奉旨日的狼狈相。

在曾国藩上谢恩折后仅四天，即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湘军登上了武昌城头，太平军守城将领黄再兴、石凤魁于先天夜已带领精壮仓惶逃往武昌下游的田家镇去了。此时，杨霨的军队尚在汉阳以北，但他抢先向朝廷报捷。咸丰帝看了他的奏报，批道：“曾国藩等攻剿武汉情形尚未奏到。塔齐布陆路官兵，



此时谅已与曾国藩水陆合为一军，着俟杨霨抵省后，商榷挑选精兵，水陆进剿。朕日盼捷音之至也。”咸丰帝当时情况不明，指令也模糊不清。待湘军攻占武昌十二天后，即九月初五日（10月26日）咸丰帝才看到曾国藩的《官军水陆大捷，武昌、汉阳两城同日克复折》，他兴奋之极，批道：“览奏欣慰。”并立即嘉奖攻克武昌、汉阳有功人员，其中“曾国藩着赏给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加恩赏戴花翎。”在这以前，朝廷任命团练大员为巡抚，已有先例，这就是诏授楚勇头目江忠源为安徽巡抚。九月十二日（11月2日）咸丰帝又批道：“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朕将兢业自持，叩天速赦民劫也。”在胜利喜悦的气氛中，君臣似乎是融洽的。

但是，在九月初五日（10月26日）同一天的廷寄中，咸丰帝却埋下了一个伏笔：“曾国藩虽系署任巡抚，而剿贼之事重于地方。”聪明绝顶的曾国藩接到署湖北巡抚的任命后，立即于九月十三日（10月3日）上折，细述了一通署湖北巡抚“于公事毫无所益”、“于私心万难自安”的道理，说自己将率水师即日启行，转瞬出鄂入皖，“鄂垣善后事宜，既不能一为兼顾”，因此恳请另“简派贤员接任湖北巡抚，以重疆寄”。他在同一天给诸弟的信中说：“兄意母丧未除，断不敢受官职。若一经受职，则二年来之苦心孤诣，似全为博取高官美职，何以对吾母于地下？何以对宗族乡党？方寸之地，何以自安？”又说：“兄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业，其名震一时，自不待言。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与虽美而远不能及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他一点也不掩盖自己的“好名，”也津津乐道自己的“名震一时”，然而他却想到，一旦成名，将得罪于名教，受讥于乡党，见嫉于友僚，因而深痛“功名之地，自古难居”。他的心境是何等矛盾！

